## 国民党组织治理失败的逻辑------

## 一个集体行动理论分析的实例

网安2201-常兆鑫-2226114409

## 摘要

国民党改组织失败的根源在于集体行动困境和制度缺陷，这种现象可以通过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与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其体现为规模扩张、成员异质性、以及激励机制失效三方面的交互作用。

## 前言

世纪前半期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最显著的变化，是从传统王朝政治体制向现代党治体制的转型。国民党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党治政权。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政治形态在漫长的王朝帝制崩溃后，中经民初军阀政权的过渡，开始向一种新的党国体制转型。中国从此步入党治时代。

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20余年。以西方议会政党轮流执政的标准衡量，一党连续执政20多年相当难得。但是国民党党治为什么这么快就趋于衰朽？这几乎是所有研究近代历史的史者均难以回避的一个终极问题。

国民党是一个老党，一个大党，却从来不是一个具有严密组织和高度内聚力的政党。国民党虽然具有强烈的一党独裁和政权垄断意识，但其“党力”相对于中国的国家规模而言，并不强大。党机器长期处于派系纷争和软弱涣散状态，其离散而有限的“党力”在相当高的程度上制约了它“训政”的力度。国民党只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这样的党如果没有强劲的竞争对手，也许还能勉强维持其统治，但它所面对的恰恰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内聚功能的中国共产党，其命运也就不卜可知了。

本文拟以国民党“治党史”为中心，试图对国民党党机器的运行机制和组织形态的若干侧面做一考察，着重探讨国民党的组织结构、党员的社会构成、政治录用体制、党政关系、派系之争与党内精英冲突、党民关系与阶级基础等方面探讨国民党组织失败的若干因素。在研究方法上，尝试从社会史的视角切入，将政治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以集体行动理论加以分析。

### 一：**组织规模扩张与管理困境的矛盾**

奥尔森的理论指出，组织规模扩大导致监督和协调成本急剧上升，同时成员个体的努力对整体目标的影响变得微乎其微，从而削弱集体行动能力。国民党党员数量从1924年的数万人迅速增长到北伐时期的百万规模，但其基层组织功能却未得到同步强化。如此庞大的基层组织，若按法理形态良好运作，将100万党员如同军队一样严密组织起来，分布于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步调一致，国民党的组织实力自不可估量。然而国民党区分部数量增加至1万多个，但大部分“有名无实”，党员对会议和活动缺乏参与热情。这种现象说明，庞大的组织规模使得基层管理失效，党员的参与感和责任感被弱化，集体行动陷入低效。

奥尔森的观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现象：规模越大，个体成员越倾向于搭便车，而不愿意承担集体成本，从而导致组织整体功能的退化。

#### 历史材料分析

1. **国民党组织规模的快速扩张**  
    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从原本一个区域性的政党迅速扩展为全国性的执政党，仅1926至1927年半年间，国民党党员人数从50万增至100万。国民党的基层组织数量随之激增，全国区分部数量达到1万多个，区党部4000多个。然而，这种表面的扩张并未带来实质性管理能力的提升。例如，当时一位国民党党员在日记中写道，“区分部有头无足，完全失却功能”，很多区党部“连基本会议也无法正常召开”。
2. **基层组织的“空架子”现象**  
    虽然国民党在组织形式上借鉴了列宁主义的严密结构，但却未能真正落实。例如，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大”党务报告中承认，各级党部存在“规模粗具但实际涣散”的问题。他指出，党员“视党章为具文”，忽视对基层的基本工作。这一现象直接导致了基层党部成为形式化的机构，其存在无法实际增强党的凝聚力和行动力。
3. **监督成本与“搭便车”现象**  
    随着党员数量的增长和组织规模的扩张，监督成本急剧增加，而很多党员因感受到自己个体努力对组织整体的作用微乎其微，选择搭便车。例如，文中提到，区党部的活动因经费缺乏和组织涣散而经常流于形式，许多党员“自由脱党”，“与党的关系仅限于挂名和领取党证”。这表明，规模扩张导致了监督困难，党员的责任感和参与感显著降低。

#### 理论论证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指出，大规模组织的核心问题在于非排他性公共产品导致的搭便车现象和协调成本上升。在国民党的案例中，党员的共同目标（革命和建设）是一种典型的集体产品，而党员人数的快速增长进一步削弱了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力。例如，大量新入党者因不理解或不认同党的核心目标，仅将党籍视为获取个人利益的工具。这种搭便车现象直接验证了奥尔森的理论。

更进一步，当组织规模扩大到百万级别时，其沟通和监督成本呈现非线性增长。国民党在基层层面显然未能建立起与规模匹配的管理机制，导致基层组织形同虚设。这与奥尔森关于规模对集体行动能力负面影响的观点完全一致：规模越大，组织内部越难以维持有效的监督和激励机制，从而导致整体行动力的衰减。

#### 小结

## 通过对历史材料的分析可以发现，国民党在短时间内的规模扩张并未带来组织管理能力的提升，反而因监督和协调成本的增加而加剧了基层组织的涣散。这一过程直接印证了奥尔森的理论，即规模扩大带来的搭便车现象和协调难题，会严重削弱集体行动的效能。

### 二：**成员异质性加剧了目标分歧与内部冲突**

奥尔森认为，组织内部成员的异质性会削弱其凝聚力和行动一致性，因为不同成员的利益和目标往往难以调和。1924年后大量“土豪劣绅、地痞讼棍”通过各种方式加入国民党，这些新成员的利益诉求与革命目标之间存在显著矛盾。例如，文中描述了一些基层党部被地方豪强控制，基层党员更多地利用党务资源谋求个人利益，而非服务于党的整体目标。

这种异质性不仅导致党内资源被滥用，还进一步引发派系斗争。例如，蒋介石曾批评国民党内部“派系之争”“纪律涣散”，这说明异质性成员的引入扩大了组织内部的利益分歧，进一步削弱了集体行动的有效性。这种现象恰好印证了奥尔森关于异质性对集体行动能力的负面影响。

#### 历史材料分析

1. **大量异质性成员的加入与目标冲突**  
    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随着党员人数的激增，特别是大量“土豪劣绅”和地方势力通过各种途径加入国民党，导致党内成员的社会背景和利益诉求高度异质化。这些新成员的利益诉求与党内的革命目标之间产生了显著的矛盾。例如，地方豪强通过控制基层党部，借助党务资源实现个人和地方利益，而非真正服务于党的革命事业中，蒋介石也曾提到，党内的腐化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方精英”和“土豪劣绅”的加入，这些成员在党的目标和资源分配上与革命派的党员产生了冲突 。

* 这表明，党内成员的利益诉求和社会背景差异，使得党内出现了不同的目标和优先事项。在革命目标的统一性与个体成员寻求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未能得到有效协调，最终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奥尔森的理论说明，异质性成员的加入往往加剧了组织内部的利益分歧，从而导致集体行动的低效和目标的不一致 。

1. **资源分配与权力斗争**

国民党基层组织中的权力斗争和资源争夺问题愈发严重。由于许多新加入的成员，特别是地方势力的成员，并未真正认同党的核心理念，而更多地将党籍视为获取地方资源和政治资本的途径，导致基层党部成为地方权力斗争的工具。例如，国民党部分地方党部的党员并没有参与党的实际活动，而是“通过党籍操控地方政权”，这种现象在1927年尤其明显 。

* 这种情况直接反映了奥尔森关的影响：当组织成员的目标和动机出现分歧时，资源的分配将成为主要争夺的焦点，而非共同的集体目标。在这种情况下，资源和权力的争夺不仅消耗了组织的力量，还进一步加剧了党内的派系斗争。这与奥尔森的“利益分歧”和“搭便车”现象相吻合，尤其是在集体行动中，成员的异质性让部分成员为实现个人或地方利益而非集体利益而行动 。

1. **派系斗争与党的分裂**  
    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极为严重，地方势力和军阀派系利用组织内部的矛盾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例如，蒋介石曾指出：“党内派系之争严重，纪律涣散，政党无法形成统一战线。”国民党在北伐过程中，虽然在形式上保持统一，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同派系间的斗争导致了政治资源的分散，影响了党内的协作和集体行动的效果 。同时，蒋介石还提到党内的“派系之争”和“纪律松懈”是党无法维持有效集体行动的关键原因.

根据奥尔森的理论，派系斗争本质上是一种典型的“分利集团”现象。党内的各个派系代表了不同的利益群体，这些群体的存在使得党的资源分配呈现出分散的局面，各个派系不再以共同的革命目标为导向，而是争夺党内的资源和权力，进一步削弱了集体行动的效能。这一现象显示了异质性成员对集体行动的负面影响，派系的形成和扩展使得党内成员的利益差异和目标冲突更加激烈，最终导致了党内的内耗和分裂 。

#### 理论论证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指出，组织的成员越是异质化，集体行动的有效成员的异质性使得组织内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难以协调，从而加剧了组织内的利益冲突和目标分歧 。在国民党的案例中，大量新加入的地方势力和社会阶层（如“土豪劣绅”）带来了不同的政治动机，他们希望通过党务资源来巩固个人和地的革命目标而奋斗。这种异质性直接导致了党内资源分配的失衡，并进一步加剧了内部的派系斗争。

根据奥尔森的理论，组织中的“搭便车”现象与“分利集团”往往与成员异质性密切相关。当党内成员的目标不一致时，集体行动将变得低效。具体来说，国民党的内部派系纷争和地方权力斗争，不仅消耗了组织的资源，还导致了党内的内部冲突，严重削弱了集体行动的整体效果。这一现象也验证了奥尔森关于异质性对集体行动的消极影响。

#### 小结

通过详细的历史材料分析，可以看出，国民党在吸纳大量异质性成员（如地方豪强、土豪劣绅）后，内部目标的分歧和利益冲突显著加剧。成员异质性导致了资源争夺、派系斗争及党的分裂，进一步削弱了集体行动的有效性。这与奥尔森的理论相符，即组织成员的利益和目标冲突会削弱集体行动的效能。

### 三：**激励机制失效导致组织动力不足**

奥尔森指出，选择性激励是解决大规模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当组织不能为成员提供明显的激励时，成员的积极性将显著降低。国民党未能有效建立选择性激励机制。例如，基层干部因无报酬兼职而难以全心投入党务工作，许多党部甚至无力支付基本活动费用。这种缺乏激励的现状导致党员对组织的忠诚度下降，进而降低组织的行动效率。

此外，奥斯特罗姆的理论进一步揭示，激励不足会导致权力和资源分配的失衡。例如，国民党中高层利用派系关系垄断资源，而基层党员缺乏明确的晋升和奖励机制。这种资源分配的不均加剧了内部的不满情绪，并削弱了集体行动的协调性。

#### 历史材料分析

1. **基层干部无报酬兼职，党务工作难以全力投入**  
    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基层干部的党务工作没有得到有效的经济激励。许多基层党部干部处于“无报酬兼职”的状态，这直接导致他们无法全身心投入党务工作。例如，文中提到“广东各县党部的经费仅为县长薪水的一半，且主要由党员自己支付”，这使得许多党部仅能维持基本运作，无法承担党务活动的实际费用

这一现象揭示了国民党基层组织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基层干部的动力不足直接影响了组织效率。根据奥尔森的理论，激励机制的缺失使得个体成员对集体行动的积极性降低。基层干部作为党内最直接与群众接触的成员，其积极性对党的凝聚力和行动效率至关重要。当这些干部因缺乏物质激励而对党务工作失去投入时，整个党组织的动力和执行力将大大减弱。

1. **党内资源和权力的集中，基层缺乏晋升与奖励机制**  
    国民党中高层通过派系关系垄断了党内资源，导致资源分配不均。基层党员和基层干部通常无法获得相应的晋升或奖励机会，许多人对党内的资源分配感到不满。例如，蒋介石在反思党内的腐化现象时指出：“各级党部虽然规模粗具，实际上仍是空架子，党员大多数不能得到党内足够的支持，且没有明确的晋升机会” 。此外，在党务活活动未能得到高层的充分支持，这使得基层党员感到被忽视，降低了他们的忠诚度和参与度。

* 这一现象揭示了奥斯特罗姆理论中提到的，激励不足会导致权力和资源的分配失衡，进而引发成员间的不满情绪。基层党员缺乏激励机制，他们的努力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这导致了对集体行动的积极性下降。资源和权力的集中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使得党内的协调性下降，内部矛盾激化，从而影响了集体行动的整体效能。

1. **基层资源不足和党务管理困境**  
    地方党部由于经费不足和组织松散，无法开展有力的党务活动。在一些地区，党部的工作人员甚至需自行解决生活问题，而党务活动也只能依赖少数人承担。这种资源匮乏使得党内许多活动无法正常开展，且党内多数党员无法得到实质性的激励，导致党员忠诚度降低 。

* 从奥尔森乏和激励的缺失直接导致了集体行动的困境。缺乏激励的基层党员更容易陷入“搭便车”状态，选择不参与集体活动，因为他们看不到参与集体行动所能带来的直接好处或回报。这不仅削弱了组织的执行力，还造成了党内资源的浪费和整体行动效率的低下。

#### 理论论证

1. **奥尔森的选择性激励理论**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指出，集体行动的成功依赖于能够为成员提供选择性激励的机制。如果一个组织无法通过激励手段让成员感受到参与集体行动的具体好处，那么成员的参与热情会显著降低，从而导致组织功能的衰退 。在国民党的情况下，由于基层干部未能得到足够的物质回得到有效执行。这种缺乏激励的情况导致了组织活力的衰退，也验证了奥尔森关于集体行动困境的论断。
2. **奥斯特罗姆的“共同池塘资源”理论**  
    奥斯特罗姆强调，在资源管理中，缺乏明确的激励和管理机制会导致资源被过度消耗，从而影响集体目标的实现 。在国民党的案例中，资源的分配极度失衡，中高层通过派系控制资源，基层党源和晋升机会，这使得基层组织的积极性大打折扣。奥斯特罗姆提出，通过明确产权、制定合理的激励机制以及分配资源，可以有效地避免这种局面。然而，国民党未能有效实施这一制度，导致基层组织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 小结

## 通过对历史材料的分析，可以看出，国民党在党务管理和资源分配上的严重缺陷，导致了基层党员的参与积极性大幅下降。根据奥尔森和奥斯特罗姆的理论，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导致了集体行动的低效和组织动力的不足，最终削弱了党的整体执行力和凝聚力。这些现象表明，激励机制的失效是组织内部动力不足的根本原因，进一步加剧了资源分配的不均和党内矛盾，从而阻碍了国民党有效的集体行动。

### 结论

**通过奥尔森和奥斯特罗姆的理论分析，可以发现国民党组织问题是规模扩张、成员异质性和激励机制失效三方面问题的叠加结果。国民党基层组织涣散、派系斗争加剧、资源分配失衡的事实，印证了奥尔森关于规模和异质性的理论逻辑，同时也验证了奥斯特罗姆对制度设计和激励失效的分析。总体来看，这种理论与事实的结合展示了集体行动困境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复杂体现，并为理解国民党的迅速衰败提供了深刻的理论依据。**

[[1]](javascript:void(0))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前夕：北京方面加入本党者，唯有学界而已；广州方面加入本党者，多是青年学生和工人；浙江及东三省加入本党者，知识阶级及退役军人最多；湖南、山东加入本党者，多为学界和工界；山西加入者大多数为学校教员和青年学生；安徽加入本党者，以学生最为踊跃，其次为工人；上海方面加入本党者，学、商、工各界皆有之；江西党员在1920年以前以军政界和留学生为最多，在1920年以后，以内地学生及工人为最多。见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3，第4～31页。

[[2]](javascript:void(0))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第117页。

[[3]](javascript:void(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第126～127页。

[[4]](javascript:void(0))王日新：《南北局势剧变后中外人士之态度》，《现代评论》第4卷第102期，1926年11月20日。

[[5]](javascript:void(0))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编印《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1926，第13页。

[[6]](javascript:void(0))《省党部代表大会报告》，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25日。

[[7]](javascript:void(0))《吴倚伧先生之国民党现状报告》，《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月15日。

[[8]](javascript:void(0))巫：《学生界有幸有不幸》，《现代评论》第5卷第105期，1926年12月11日。

[[9]](javascript:void(0))彭学沛：《今后的党员》，《中央日报》1928年2月18日。

[[10]](javascript:void(0))《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第93页。

[[11]](javascript:void(0))刘华峰、王雨亭主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第390、474、507页。

[[12]](javascript:void(0))《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663页。

[[13]](javascript:void(0))《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报告》，《中央党务月刊》（三届三中全会特号），1930年3月。

[[14]](javascript:void(0))参见《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第468页。

[[15]](javascript:void(0))《上海特别市党部为征求党员告同志同胞书》，引自郑祖安《二三十年代上海市政府横向关系初探》，《学术月刊》1994年第3期。

[[18]](javascript:void(0))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第93页。

[[19]](javascript:void(0))革命救国团编印《蓝衣党的罪恶》，1933，第1～12页。

[[20]](javascript:void(0))蒋介石日记，1932年3月2～3日、4月20日。

[[21]](javascript:void(0))王瑾.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理论述评[J].国外社会科学,2006,(02):45-52.

[[22]](javascript:void(0))张振华.当奥尔森遇上奥斯特罗姆:集体行动理论的演化与发展[J].人文杂志,2013,(10):113-121.